



各民族文学对生态文学观念的拓展与重构

□杨一丹

在众多民族文学作品中,自然不仅是生命价值的物质载体,更是生命内在精神与意义的生成场域。各民族文学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在哲学上深化了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文学已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当前生态文学的主流理论体系仍以西方视角为主,侧重于对生态危机的宏观书写与哲学批判,较少关注地方性知识与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叙事可能。中国民族文学则以其深植地域的叙事传统和对自然的情感性书写,为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路径。这些作品扎根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赋予自然主体性,在地方化经验中呈现出人与自然情感交融、命运相依的微观文学图景。这种独特的生态表达,不仅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展现了自然与人类共生共感的价值理念,也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空间与伦理维度,成为建构多元生态文化的重要资源。

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书写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学研究首先要批判的一种思想观念。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他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圣经》所建构的人类—自然观,“所有造物除了服务于人类之外别无其他目的”。而中国众多民族的创世神话故事,其中就已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念。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自然界的山川河流、风雷雷电都被赋予了主体性,甚至成为故事的重要角色。自然并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而是与人类平等地存在。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中,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这种叙述强调人类起源与自然界的联系。无独有偶,苗族创世神话中,蝴蝶母亲是万物的起源,而且蝴蝶母亲并非单独偏爱人类,而是公平地创造和对待所有生物,反映了朴素的万物平等、生命共荣的思想。这些神话故事通过将自然元素拟人化、神圣化或直接赋予其创造生命的能力,强调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表达了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也为现代社会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有力参照。

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人与自然的和谐仍是民族文学的重要主题,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依托,更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作家艾吉的《梯田里的哈批》通过讲述后土司时代的哈尼生活,以“昂玛突”(祭山仪式)等祭祀活动反映了哈尼族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重要成员的意识,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融汇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他习惯将自然要素人格化,凸显自然界的主体性,展现出浓厚的生态意识和对自然的深情礼赞。藏族作家阿来的《月光下的银匠》用大自然默默不语的坚强和温情成全了小银匠达泽对艺术与信仰的追求,在大自然的恒久面前,小银匠的悲苦

故事最终得到了升华。

在蒙古族文学作品中,草原戈壁意象占据着核心地位。很多作家通过讲述人与自然、历史与文化交织的故事,将草原描绘为蒙古族文化的生命之源。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狼獾河》不约而同地将草原精神化、文化化,以草原的兴衰隐喻人类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匮乏,体现了对自然温情的深深眷恋。对自然意象的极度珍视不仅是对各民族自然崇拜的文学传统的沿袭,更重要的是,自然元素已经内化为他们想象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蕴含着少数民族的伦理观和生态智慧。在众多民族文学作品中,自然不仅是生命价值的物质载体,更是生命内在精神与意义的生成场域。

“人学”以外的叙述方式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指向往往是关注人和人类社会,从人的价值和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这有其必然性,也创造了巨大的思想和美学价值。然而,从“人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还远远不够,离开了自然,就无法全面完整地认识人和社会。通过民族文学,恰恰可以发现“人学”以外的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大自然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是背景,更是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读者从中能够深刻感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密性。

佤族作家张伟锋的《空山寂》以佤族村寨的山川草木为叙事主体,呈现了自然丰荣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关联。森林不仅是故事的舞台,更是具有生命力的性灵存在。满族作家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建构了一种人与动物的矛盾共生关系,以人们杀死最后一只华南虎后的精神空虚批判了功利自然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父亲鱼游而去》不断在人和动物之间转换身份和叙述视角。仫佬族作家廖润柏(鬼子)的《八月,干渴的荒野》将大地拟人化,讲述了生态的变化与文化的衰退,将大地的声音和人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叙事模式,也为在人的价值之外重构审美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生态主义叙事的核心在于,赋予自然以主体性,使其不再只是被动的背景或资源,而是与人类共同构成生活的整体。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框架,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重要地位。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民族文学的这种叙事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化与情感性:人与自然的微观互动

对照西方的生态文学理论,可以发现中国民族

文学在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情感维度上的独特贡献。西方生态文学理论通常关注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发等全球性生态危机,并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关系为核心议题。中国民族文学则通过扎根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地方性叙事,展现了人与自然具体生动并充满情感的互动。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结合,不仅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现范围,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全面的生态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民族文学常着眼于地方性的微观议题,以具体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符号为依托,通过地方性叙事展现人类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哲学。这种具体而微的描写,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全球性宏大叙事形成互补,为生态文学理论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视角。瑶族作家光盘的《烟雨漫漓江》通过漓江流域居民的生活叙事,展现了河流在广西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漓江边的小人物来展现人类生产活动与河流如何保持和谐。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的小说集《蓝雪》描绘了游牧文化中与草场的互动,通过描写生态退化问题,为现代牧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也对全球性的土地退化问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

与西方生态文学注重生态批判不同,中国民族文学更强调人与自然间的情感连接,这种独特的生态视角通过叙事、象征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多维度的展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七叉犄角的公鹿》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驯鹿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精神信仰的载体,体现了鄂温克族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活哲学。在同样展现鄂温克族生活的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与森林、河流、动物产生强烈的情感互动。这种情感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态审美视角,弥补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常见的抽象化和工具化倾向,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表达方式。

中国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生态观念,为生态文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在哲学上深化了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一是强调自然的主体性,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建构多元的生态伦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二是关注地方性知识,通过地方化叙事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三是将生态伦理与人类情感深度融合,通过这种情感化叙述,为生态文学注入人文关怀的温度。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评论

我无力读完煌煌五十卷的《白庚胜文集》,只能抽出其中一卷《团山文源》谈谈感想,盖因团山也是我的故乡。

故乡是游子心中唱不尽的赞歌。白庚胜青年时期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至今已40余年。乡音虽然大改,不改的是对故乡的魂牵梦萦和一往情深。代序《团山小记》中说:“余之故乡曰团山,因重山怀抱而名之。”“虽居山中,团山却不为崇山峻岭所困,不甘封闭自守。”“是故,余爱余乡,凡土地人民、清风白云、风俗习惯无所不爱……”落笔千言,让地灵人杰、多民族水乳交融的团山跃然纸上,引发读者对这个藏于深山人未识的古村落的向往。

白庚胜对故乡的深情厚谊是多维度的。人们可以从《慨当以慷,歌以咏志》中,品味到他对内侄的殷切期望;从《民族文化的诗意书写》中,读到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高尚情操。他为众多乡友的新作写序,为纳西文化的点滴进步欣喜,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劲,表现出长者风度。一路走来,白庚胜数十年如一日地艰辛探寻着民族民间文化的踪迹,为纳西文学文化发展发出“新声”。

我从书里还读到他那颗感恩党、国家、时代、生活、人民的心。通读《团山文源》一书,我感到白庚胜在完成对家乡团山的深情回眸的同时,也实现了用开放的视野拥抱祖国,其生命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红线。《谈谈纳西族的忠义爱国传统》诠释了纳西族维护国家统一、重视民族团结、忠于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所在,充盈着爱国、爱乡、爱民族的大爱。

如果说《丽江文化新亮点》《沙场秋点兵》《我和我的纳西族民间故事》《人间奇迹石头城》《我的学校我的老师》等篇章,更多关注的是丽江或纳西族的文学文化发展状况,那么《域外拾珠东巴异香》《〈文化遗产保护论说〉自序》《共享文明》《〈和谐文化知行录〉后记》《〈纳西学研究〉发刊词》《郭沫若与纳西文化二三事》等篇什,则是他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攀登思想哲学高峰的精神结晶。

他认为,“如果说先行者们在五十年前采取主动精神,顺应民族解放的潮流,完成了丽江历史的伟大转变,那么,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更应站在时代的高度,胸怀天下,审时度势,创造历史,重塑辉煌。”他坚信,“纳西人民必将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作出应有的贡献”。从中足见他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回家的路》写丽江历史上的行路难,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了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天上地上四通八达,北京到丽江不再遥远。作者由此发出感慨:“我会永远铭记路从哪里来、路往哪里去,铭记路由谁开拓、路靠谁维护。这将使我永不迷失所处的方位和前行的方向。”这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最后一公里,高架连

故乡礼赞——评白庚胜随笔集《团山文源》文化颂歌

□和振华(纳西族)



心桥》《天雨正流芳》等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白庚胜的不少作品,奋力谱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盛况。《团山文源》除对民族进行礼赞外,也关注其他民族的命运。如《呼吁抢救江边文化》一文中提到:“在民族关系上,工程区自古分布有众多的民族,纳西族、汉族、白族、藏族、彝族、苗族、普米族、傈僳族、傣族曾经在历史上共同开发了这片富饶的土地,并早已凝结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保护江边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这些民族的共同利益。这对尊重历史传统、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他时刻践行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和发展进步的使命,不忘来时路,如绿叶对根作深情的回报。

该书知识性、史料性、逻辑性强,让人受益匪浅,而文学性、艺术性、哲理性则贯通全书,弘扬了主旋律,激昂了正能量。《团山文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纳西族农民的儿子从丽江出发,成长为作家、学者的文化苦旅,也看到了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看到了他踔厉奋发、回报生养他的故土和培养他的祖国的身影。

(作者系作家)

关注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意性书写,对时代气息的敏锐捕捉

□赵卫峰(白族)

我意识明显强化。各民族诗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首先是自我存在的思考和表达者。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关心与自我关怀同等重要。从个人性到多样性,诗人对现实环境及种种情感、生与身的体验过程,其实也是群体精神文化的具体映照。

二

民族及民族文学研究近百年来收获丰富,民族诗歌作为话题仍有较大空间。各民族早期诗歌文化相对属于稳定性传统路径,拥有共识性的认知体系,创作与批评时常也默契于特定意义表现。当一茬茬诗人逐步置身时代现场,汇入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难免会与“原地”和“民族性”有所距离而失却辨识度。这种困窘将长期存在,亦是与机遇同在的挑战。而推陈出新始终是文学创作的生命力所在。新,指观念也包括形式与语言的适当翻新,井水河水海水各有千秋,各有风姿的主体性视角与情感可以刷新现实与记忆,为自然及乡土赋予独到的诗意。

自古以来,诗歌对于国家、地区和民族而言就是悠远的精神“指路经”和文化旗幡,其创作、传播及接受有着不同路径与时差,大方向则是共识性的,它终会靠近文化、文艺、文学的“共同体”,融贯之后又开枝散叶。由此亦可说,越人歌、格萨尔或楚辞其实从未停顿,从不只是孤岛独峰般只属于当时当地。从《诗选》中亦可见,各民族诗人的自我创造、身份认知和自我意识等多方面都从容且丰富,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文学资源的汲取与消化,体现为对文化传统进行继承基础上的革新。

三

从音乐类的歌、说唱类的谣到诗歌诗联合,再到现代意义和文学性层面的汉语新诗写作,这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文明链条,是具有非物质属性及活态存在特征的精神传奇,也是各民族诗歌成熟渐显的过程。就《诗选》看,很多作品均呈现出具有现代特征的新经验、新表达,各族优秀诗人正稳步迈向

当代汉语诗歌的高峰。

全球化、数字化、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等各种“化”的现实交错,是所有作家诗人共同面临的背景与环境。近年来,各类语言甚至包括外语在内的多类型写作实践渐多,也给民族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参考。

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其存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经过了岁月检验。它是中华文化传播与认同的主干载体,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合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时空制约,改善了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种种。作为文化实践者的各族诗人当然也是敏锐的感知者和前行者,他们的涌现及其意义在于自觉转型,合流于主流之中,二者在多元交融中互哺,推动各民族文学及诗歌文化生态得到互鉴更新,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诗歌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保障了其传承与创新的连贯性。汉语或普通话本身也是多元化的聚合,正如《诗经》和《离骚》至今还在传递中国诗歌中的人文精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兼容并包,

促成了诗歌文化在不同时段的生机与辉煌。及至西学东渐、新诗勃发,中国诗歌始终在兼收并蓄、流变融通中开拓,各民族汉语诗歌正如此理。换言之,各民族诗歌传统相对维系了本民族的民族性及历史文化,各民族的汉语诗歌则共同维系着中国诗歌文化传统特性及整体性,二者合力共建了新的历史时期下的中国文脉。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诗歌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歌让“时、地、人”形成了某种精神共同体,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诗人相认,其认同共建并促进了汉语文化的丰富与完善。各民族诗人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拓展了汉语的文化视野及现代化实践,亦对民族文学有创新性充实。

四

现当代民族诗歌经过多个历史阶段,每个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转型。转型并不意味着截断。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促使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与网络伴生的写作者在文学界占比甚众,

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写作的种种既定规约,或者说在写作中,不时体现出对语言才能的自我证明。当代各族诗人的语言方式明显繁杂多维,较多使用包含古典趣味的书面汉语,以及方言、戏剧、俚语的杂糅。杂糅是技能也是力量,是诗歌在数智时代的“跨界”动力与多文化碰撞的结果。相较而言,年轻诗人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借鉴更为充分,其写作的主体性与语言个性也更为明显。在完成对城乡经验、情感经验、阅读经验的理解与融通之后,“00后”诗人将会达到诗意认知与艺术超越的新高度。

《诗选》虽然是管窥式的,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当代民族诗歌表现的多样性、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的活态关系。选本的推出既是补缺,也是提醒,提醒写作者在坚持并更新民族性、地方性精神的同时,也要不断与传统对话、与历史对应、与现实环境对接,每一语言个体的自我完善始终是关键,也是构建“语言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诗人、《中国少数民族诗选》主编)